

三聯人文書系

陳平原 主編

陳來 著

宋明儒學論

易有
太極
是生

但願溫
恭直諒
之友來
此講學
論道示
孝友

三聯人文書系

主 編 陳平原

責任編輯 俞 笛

書籍設計 彭若東

書 名

宋明儒學論
陳來

著 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 版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三〇四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版 次

二〇〇八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三十二開 (141×210 mm) 一二四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 . 962 . 04 . 2796 . 1

© 200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總序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

得非追韓摹柳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着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裡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向有

出版大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畫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着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

拙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目錄

小序·····	001
李延平與朱晦庵·····	003
朱熹淳熙初年的心說之辯·····	047
王陽明哲學的心物論·····	075
王船山晚年的思想宗旨·····	105
宋明儒學與神秘主義·····	145
王陽明與陽明洞——王陽明越城活動考·····	187
作者簡介·····	210
著述年表·····	211

小序

香港三聯書店要出版一套「三聯人文」書系，每本書由作者選其若干研究論文，主編邀我參加其中，我便應允了。不過篇目之選，並不容易，我考慮之後，選了六篇。

我的研究領域，從學科來說，是屬於「中國哲學」。而我所研究的歷史時段，雖然也包括古代和現代，但究竟以近世為基地和主幹，故本書所選收的論文，以宋明儒學為其主題。由於我對宋元明清理學的研究，以朱子學、陽明學、船山學為主，故本書的《朱熹淳熙初年的心說之辯》、《王陽明哲學的心物論》、《王船山晚年的思想宗旨》，即分別相應於這三個方面，而突出其哲學的研究。

事實上，所謂「中國哲學」的研究，無論在對象和方法上，都不限於西方意義上的哲學，包含略廣。如本書所收的《李延平與朱晦庵》屬於道學思想史的研究，《宋明儒學與神秘主義》是比較宗教學取向的儒學研究，而《王陽明與陽明洞》則是考證的文章。由這幾篇可以了解我的宋明儒學研究的一些其他側面。

當然，由於篇幅的限制，無論從哲學的研究，還是從其他取徑進行的研究，本書還無法反映我對宋元明清儒學研究的全貌，更不能容納我在古代思想和現代哲學方面的研究，但這些論文，在彰顯我的研究的特色方面，還是有代表性的。

二〇〇八年五月於北京

李延平與朱晦庵

朱熹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見李侗於延平，延平告以儒釋之辨，此後年歲之間，朱子頗味延平之言，漸覺禪學之非，而立志歸本伊洛，此一過程及相關事實考辨，我已有文為之詳述。^{〔一〕}本篇則專論朱子與延平授受淵源與思想關係，故以《延平答問》為主要材料。按《延平答問》為李侗答朱熹論學書，其第一書在紹興丁丑（一一五七年）六月，時朱子二十八歲，尚在同安為主簿。以其書中之語觀之，並非延平與朱子初次通書，以此推知，在此之前延平、朱子之間當已有書。朱子紹興癸酉（一一五三年）見延平，時二十四歲，李延平卒於隆興元年癸未（一一六三年），時朱子三十四歲，兩人交往近十年。即使自紹興丁丑至癸未計之，亦近七年之久。李朱在此期間的思想交往，對朱熹思想發展影響很大，對李侗晚期思想也有重要意義。本章因站在朱子思想研究的角度，注重丁丑戊寅之後朱熹所受李侗的影響，以及朱熹與李侗思想的差異和此種差異在理學史發展中的意義，故對延平晚年思想因受朱子之刺激而發生的變化不予討論。

一、道南之傳

李侗字願中，福建南劍州劍浦人，因久居延平，學者稱「延平先生」。「考亭朱氏出

延平李氏，延平李氏出豫章羅氏」^{〔二〕}，李侗是朱熹早年最重要的老師。

李侗曾從學於羅從彥（字仲素，號豫章），羅從彥為程氏門人楊時（龜山）的高弟。《宋史·羅從彥本傳》：「羅從彥字仲素，劍浦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從彥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徒步往從楊時受業，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講易至乾九四爻，告以曩聞伊川說甚善，從彥即裹糧走洛，見而問之。頤反覆以告，亦不外是。乃歸卒業，盡得不傳之秘。」朱熹也說：「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又說：「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二人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務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三〕}龜山親學於程顥、程頤，當其歸家時，程顥嘗曰「吾道南矣」，寄望頗殷。政和初龜山為蕭山令，羅從彥已四十一歲。「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四〕}《宋元學案》稱：「往洛見伊川，歸而從龜山者

〔一〕 朱子此一期間之思想研究，還可參看錢穆所著《朱子新學案》的相關章節。

〔二〕 劉將孫：《豫章稿跋》，《李延平集》卷四，叢書集成初編本。

〔三〕 《朱子文集》（四部叢刊本，下簡稱《文集》）卷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狀》。

〔四〕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豫章學案》黃百家按語，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一二七七頁。

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為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飢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故於世之嗜好泊如也。」〔二〕羅從彥雖亦親見伊川，其學問宗旨畢竟得於龜山楊氏，故《宋元學案》雖稱其為程楊門人，終歸之於龜山門下。而後來竟有「南劍三先生」（楊時、羅從彥、李侗）之說，以羅從彥獨得楊時真傳而再傳於李侗。

政和末，李侗從學於羅從彥〔三〕，其初見時以書謁，略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四〕羅從彥對李侗也頗器重，其與陳默堂書云：「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個半個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猶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願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並從彥所作詩呈左右，未知以為然否。」〔五〕李侗從學羅從彥後，頗守其傳，從彥孫羅博文與李侗往來甚多，對李侗之學很為推崇，亦言「延平先生之傳，乃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遠流長」〔六〕。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正月，朱熹自同安罷歸，經延平再見李侗。不久朱熹與范如圭有書，中說：「李丈

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於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得其闡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六〕}這也表明，至少在紹興末，李侗的洛學淵源差不多已是眾所周知的了。李侗死後，朱熹為作行狀，其中更強調李侗在洛學正傳中的地位：「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七〕}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七〕}

朱熹曾概述李侗的學問思想：

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

【一】《宋元學案》卷三十九《豫章學案》，第一二七〇頁。

【二】《羅豫章集》，《年譜》，叢書集成初編本。

【三】《初見羅豫章先生書》，《李延平集》卷一。

【四】《與陳默堂書》，《李延平集》卷四。

【五】《李延平集》卷四。

【六】《文集》卷三十七《與范直閣》。

【七】《文集》卷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狀》。

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歷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匯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慾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雲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

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一〕

根據朱熹所說，李侗學問大旨有四，即「默坐澄心」、「灑然融釋」、「體驗未發」和「理一分殊」。只是，在這幾個方面，李侗自己的表述和側重與經過朱熹精心調整而加以細微改變後的表述與側重有所不同。我們將在下面對此作進一步的研究。

二、體驗未發

李侗一生得力處在「靜中體驗未發」。《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二〕，程頤與其門人呂大臨、蘇季明等曾多次討論過「未發」與「已發」的問題，但關於未發已發的心性論和功夫論意義程頤曾有幾種不同的說法，而且這個問題在程

〔一〕《文集》卷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狀》。

〔二〕《中庸》，第一章。

顧思想中並不佔重要地位。二程高弟楊時則把「未發」的問題作為其思想體系的核心。他說：「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二〕}又說：「《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意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三〕}由於楊時重視喜怒哀樂未發時的體驗，所以強調「靜」的功夫，他說：「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四〕}羅從彥學於龜山，深得此旨，「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為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飢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故於世之嗜好泊如也。」^{〔五〕}羅從彥入羅浮山靜坐，並不是坐禪入定，兀然無事，而是靜坐體驗未發氣象。

羅從彥所以授與李侗者，亦正是「體驗未發」。《延平答問》載李侗與朱熹書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問學，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五〕}李侗初學時只是學羅之靜坐，羅從彥告以當於靜中體驗未發時作何氣象，李侗就此用力，一生未變。故朱熹於《延平先生行狀》說：「先生既從之（從彥）學，講論之